

主编 王新陆

中医文化论丛

齊魯書社

主编 王新陆 副主编 王振国 藏守虎

中医文化论丛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文化论丛/王新陆主编. —济南:齐鲁书社,

2005.11

ISBN 7-5333-1576-6

I . 中... II . 王... III . 中国医药学—关系—传统
文化—文集 IV . R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409 号

中医文化论丛

主编 王新陆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E-mail: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 插页 229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576-6

R·4 定价:20.00 元



编者寄语

关于“文化”这一概念，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与界定，我们也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与界定。

我们认为，从广义、静态的角度上来说，文化应该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在内的一切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从狭义、动态的角度上来说，文化是指人类的思想精神的相互影响、教化。

从词的构成看，“文化”由“文”、“化”组成，是一个动宾结构词组。“文”，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中云：“文即文身之文，象人正立形，胸前之ノ、丶、乂……即刻画之文饰也。”《说文》曰：“错画也，象交文。”花纹、纹饰是“文”的本义，而花纹、纹饰的出现正是人类思想精神的物质体现与反映。“化”，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云：“化（古文）象人一正一倒之形，即今俗所谓翻跟头。”《说文》曰：“教行也。”《玉篇》亦曰：“化，易也。”文、化含义即指思想精神的教化、影响，《周易·贲·彖》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其义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文化”一词的语源，也是本书书名所用“文化”之义。

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医学是具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属性的学科。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



思想文化,本身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无时不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易学、儒学、道学的影响;同时,中医学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一种互动的态势。同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本身有很多内容应纳入中医学体系中,如儒家关于社会与健康、道家关于自然与健康、历代思想家关于道德、心理与健康等内容,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新健康目标是很切近的,是新形势下人类健康所必需关注的内容,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充分发掘和利用。因此,加强中医文化的研究是中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在更宽的视野下透视中医思想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有利于中医学的改造、创新。

多年来,我校有一批学者一直在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医,但尚缺乏专题性、系统性、有组织的研究。有鉴于此,在学校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于2002年成立了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中心,挂靠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采取专、兼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以加强和统筹这方面的研究。在各位老师的努力下,在各级科研课题的引领下,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尤其是在易学、儒学、道学、民俗、文字与中医文化等专题研究方面,已经大有成效,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个集子即是近年来我们关于中医文化研究部分学术成果的汇编。

通过这个集子,我们希望对以往的工作作一个总结,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找到基准;更希望这个集子成为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的一个平台,起到在中医文化的研究中相互交流、批评与提高的作用!

编 者

于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中心

二〇〇五年三月

序 言

王新陆

按照现代科学分类，医学归属于自然学科是并无疑义的。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医学已经开始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近来又有人将医学定性为“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交汇渗透的综合学科”，但人们关于医学自然学科属性的本质的认识并未有多大改变。尤其是就研究方法而言，甚至一直采用的是纯自然学科的手段。作为医学分支之一的中医学，无论是按照逻辑推理，还是按照中医界学者的主观愿望，将其归于自然学科门下似乎也无疑义。如若不然，即中医若不归属于自然学科，其含义几乎可以与“不科学”划等号，对此无论中医界本身还是热爱中医的人士都是无法接受的。正因为如此，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医药研究便自然而然地照搬了西医模式，选择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并力图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标准来阐释或证明其科学性，企图由此求其发展。然而，良好的愿望和努力的工作并未能对中医药的进步产生预期的效果，冷静而客观地分析近百年来中医药的发展历史，不得不使我们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即单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是不是惟一的和最佳的途径？进而，我们也不得不反观中医学的



学科属性问题。

一、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学者们已经达成了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共识:即中医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更确切地说,中医药学是在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易学、儒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军事学等许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如古代哲学中的“气”、“阴阳”、“天人合一”等学说与中医学理论一脉相承。再如中医素有“儒医”、“道医”、“佛医”之谓,可见儒、道、释对中医影响之深。至于天文、历法、音律、军事、农学等对中医学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中医理论采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可以说,从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到理论方法,从治疗思想到治疗手段,无论哪个方面都直接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另外一个方面,即中医学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农学、军事学、语言文字学等,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源于中医理论的“一分为二”、“先天不足”、“治病求本”、“对症下药”、“未病先防”、“以毒攻毒”等术语的广泛使用,足以说明这种影响的广泛与深刻。这种影响不仅表明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中,无不蕴含着中医学的繁衍基因。正如胡道静先生所云:“中医学这一生命文化的胚胎,是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推进的舵桨,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世界文化的分水岭。”(《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序)

本文不想再作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老生常谈,而是想通过上述两方面的成熟见解,来表明一个基本观点,即中医学

不应机械地划归为自然学科，实际上它是一门自然和人文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并完美结合的交叉学科。可以说，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独树一帜的特殊文化现象，中医学理论是自然知识与人文知识交叉融合的产物。其实，不仅中医学具有人文属性，西医学同样具有，只不过中医学的人文属性显得更加鲜明、更具特色罢了。正确认识中医学的这一基本属性特点，是当前继承和发扬中医学术所必须正视和重视的关键所在。

二、关于中医学发展缓慢的原因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和探讨中医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或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产生的保守、局限等消极作用，或认为中医缺乏自身的理论而只是依附哲学、经验而生存，或探析中医学采用了经学思维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而故步自封，或指出传统的中医教育方式落后等等，的确是仁智之见。这里，本文不拟对此展开深入讨论，只想表明笔者对此问题的一点基本看法。

其一，近几十年中医学发展缓慢不等于几千年来中医学发展缓慢。无论是对中医学的历史作纵向考察，还是将中医学与世界医学作横向比较，我们都没有确切的理由说明中医学发展缓慢；相反，中医药在许多方面都是走在世界医学前列的。所以中医完全不必妄自菲薄。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西医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之下，在近一二个世纪，尤其是近几十年，中医学的确发展缓慢，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倒退。这正是今天我们所必须关注和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

其二，近几十年中医学发展缓慢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对中医学学科属性的认识偏差。由于过分强调中医的自然学科属性，一味按西医模式研究中医，割裂了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忽视了中医学的文化属性，因此导致了中医从思维方式上的偏



离,对中医本质的理解离中国传统文化越走越远。对于中医学中如“常达变”、“医者意也”、“因人制宜”等重要思想,或避而不谈,或谈而不深不透。与其相反,对于“滋补肾阴”却要寻求物质基础,“苦能坚阴”却要经得起实验验证,“心主神明”却要符合现代医学解释。诸如此类,完全将中医摆在了自然学科的位置上加以检测和衡量。殊不知哲学属性与物质基础、辨证论治与证候模型、因人制宜与可重复性及统计学意义之间本来就不是一码事。

其三,人文因素对中医学发展存在负面影响。强调中医学的人文属性,不等于说中国文化对中医学的发展都是有利的。诸如一些带有玄虚、迷信色彩的东西,确实对中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再比如,由于受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文化氛围的影响,我们今天讲阴阳,往往过分强调阴阳的对立和斗争,又在对立斗争的基础上讲平衡,忽略了阴阳之间“和”的前提,从而使得对中医学的一些概念、理论、方法在认识上出现了一定偏差和不足,也应引起当今学者的注意。

三、正视中医药学人文属性的意义

21世纪,中医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同时又预示着美好的希望和前景。然而,无论从中医自身发展的要求,还是从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需求,其任务又是相当艰巨的。尽管现代文明在日益进步,现代科技在飞速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能够较好适应中医药发展的可行之路,也就是说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没有真正解决中医的问题。经上述分析认为,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忽略了中医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所独有的文化属性。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以往对中医所采取的现代化研究,主要沿用了现代医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因此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有鉴于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医药人文属性的



意义。

从文化角度研究中医,是研究中医的有效方法之一。历史表明,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氛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就其基本特点而言,中医学在强调联系、整体的大前提下,又非常注重个体的差异及动态的变化,在诊疗过程中尤其强调其人、其时、其地的变化,辨证用药是十分灵活而复杂的。而这与建立在解剖、实验基础上的西医理念,有着极为明显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本来,从人文角度很容易理解的中医理论,以现代科学的角度去证明则极易被否定。由于忽略了这种差异的存在,在对中医的研究中,完全采取西医还原论的指导思想,运用生理、病理、生化等定量手段,来研究具有文化含义的诸如“心主神明”、“肝主决断”等命题,其结果不仅没有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带来积极影响,相反还把中医的一些富有文化内涵的东西丢掉了,这是十分可惜的。因此,我们主张中医学研究首先应继承传统的研究方法,加强人文方面的研究。而且要从教育入手,切实加强中医学习者的人文修养。

从文化角度认识中医,是进行现代中医研究的前提。我们并非反对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中医,但也绝不是盲目地相信现代科学技术能一下子把中医说个明明白白。因此,我们主张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认真研究中医,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文化、中医经典、中医原著、中医临床等方面入手,正确地审视和领悟中医学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如分子技术、生物技术、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等,周密设计科研思路。我们尤其反对把传统与守旧划等号、急功近利和热衷于杜撰新理论、创建新学说、建立新体系的所谓中医现代化研究。

大而言之,整个科学的人文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我们没有理由忽视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理由忽视中医学的文化属性。

目 录

编者寄语	(1)
序言	(1)
周易与中医文化	(1)
《易》医关系论	(1)
十二辟卦、伤寒欲解时与时间医学	(13)
论《易经》之“朋”为“阳”	(19)
《易经》之“孚”与天人合一	(25)
《易经·姤》卦中的婚育观念发微	(36)
饮食·男女·鼎新	(43)
《易经》中固有的医学思想探析	(56)
《易经》“七”周期与中医疾病转归说探析	(60)
儒家与中医文化	(68)
儒学对中医思想体系的影响	(68)
儒家“致中和”思想与中医稳态理论	(78)
儒家对生命的人文关怀	(85)
古代养老礼法述略	(96)
汉画像石中的养老图	(108)
格物知医简论	(115)
试论宋儒治学方法对宋《伤寒论》文献研究的影响	(119)
试析宋士大夫私人编撰医书兴盛之原因	(124)



道家与中医文化	(128)
试论《老子》之“道”源于《易经》	(128)
道家养生术对中医药的影响管窥	(134)
《饮膳正要》“神仙服饵”方浅析	(144)
王冰道家思想探析	(148)
略论道家文化对《千金要方》的影响	(152)
道家性命双修养生学思想探赜	(157)
道、医“悬壶”的文化意蕴阐释	(162)
道家复归婴儿的现代养生意义	(167)
道家复古与现代养生的哲学思考	(174)
古代思想文化中的德寿思想浅析	(181)
民俗与中医文化	(186)
古代民俗与中医治法的起源	(186)
论敦煌“咏伤寒”词的医药学与民俗学价值	(192)
从《伤寒论》看汉代食俗对中医药的影响	(199)
汉画像石中鸟图腾与中医关系之考析	(207)
黄帝、鵠夷、浑脱、浑沌互考	(214)
文字与中医文化	(223)
文字中所反映的健康观念的变化	(223)
三阴三阳探源	(233)
气与生命	(244)
《伤寒论》“和”字析义	(255)
中医“臍(胪)”字析义	(260)
“讓(让)”之病名沿革	(265)
中药方剂名称中的形近字互用个例考	(275)
《医古文》词语的文化阐释五则	(284)
编后记	(289)

周易与中医文化

《易》医关系论

王新陆

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熟《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由于孙思邈在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影响，“不知《易》不能为大医”之说遂代代相传，研究《易》医关系的名家辈出，论说颇多。概而言之，影响较大，常为人称述者有三，即“医易同源”说、“医源于易”说、“医先于易”说。三说孰是，各执一词。其实三说各有立论的依据，也各有其认识的局限性。所以，辨析《易》医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把握中医学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医易同源”论

“医易同源”说出于明代医易大家张景岳：“易者，易也，具阴阳

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类经附翼·医易义》）可以看出，张氏的“医易同源”说，是基于《周易》与《内经》阴阳变化理论的相通而立论的。实际上，“医易同源”，有多方面的证据。

1. 同源于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人类生活的体悟与感受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华夏先民特有的原始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如天人相应观念（“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阴阳观念、常变观念等，即源于对华夏文化特质的一脉相承。《易经》是中国哲学的经典，就《内经》而言，则不仅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代表作品。在《内经》理论形成的时代，还谈不上独立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古代哲学家往往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这一点在中医学领域表现得尤为充分。他们善于从直觉出发，在总体上观察世界，因此，“十分自然地把自然世界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做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①。比如，《内经》中论说阴阳的言辞出现的频率以及论述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周易》、《老子》等哲学经典。《周易》的阴阳观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周易·系辞传》），存在着扶阳抑阴的倾向。《老子》的阴阳观则是“柔弱胜刚强”，倾向于扶阴抑阳。而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则讲求阴阳的协调平衡。如《内经·阴阳应象大论》：“凡阴阳之要，阳秘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可以说，中国古代阴阳哲理最完整、准确、系统的体现，是在中医学经典《内经》的理论体系之中。无疑，中医的阴阳观受到《周易》的影响，但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只能说医与《易》是同源的。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4页。

2. 同源于巫史文化。关于医学的起源,有多种主张,除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外,尚有“源于圣人”、“源于动物本能”、“源于巫”等说法。医源于巫之说,曾受到批判。但医学与巫术的源流关系,应是毋庸置疑的。在巫史文化时代,巫是掌握“文化”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是占筮者,同时又往往是治病的医家。《山海经·海内西经》:“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有学者称:“巫一般被认为是医之父母。”“毋庸置疑,医学起源于巫术,……最早的医生就是巫师,最早的医疗手段,就是巫术仪式。”^①以马王堆出土医书《五十二病方》等为代表的早期医学文献中,巫术的痕迹依然相当明显。可以说,《内经》以前的医学是巫术医学,《内经》医学是从巫术医学脱胎而来的。祝由是中国巫术的特色之一。《素问·移精变气论》所载的“祝由”法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祝由科”,直到清代才从官方医疗机构中消失,但迄今为止,仍可从中医药典籍中寻觅到浓厚的巫韵。《周易》是古代巫觋占筮的典籍。其思想从新石器时期的天人互感、万物化生的观念,历经夏之玉器时代、周之蓍筮时代,从原始筮占的整理,产生了《连山》、《归藏》、《周易》,其与巫文化的血脉联系自不待言。但应当说明的是,巫史文化只不过是医学发展过程中曾经走过的一个人阶段,并不是中国医学的真正源头。巫医的出现是古代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果,而医学的进步则依赖于对种种超自然的神秘巫术的破除,这是医学发展史上的辩证法。在经过了巫史文化时期之后,巫文化向着不同的方向分化与演进,丹波尔《科学史》说:“巫术一方面直接导致宗教,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科学。”

^① 邱仁宗:《医学巫源说和医学起源问题》,《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期。



3.《周易》、《内经》与河图、洛书的关系，也是“易医同源”说的依据之一。有关河图、洛书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顾命》和《洪范》），《周易·系辞》开始将二者列为《易》学体系，并认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至宋初，始有华山道士陈抟以图传世，并进而形成河洛学派。自《周易·系辞》指出画八卦的依据是河图、洛书以后，孔安国、刘歆、马融、王肃等易学家均持此说。而关于河图、洛书的时代真伪则一直未有定论。赵国华从对西安半坡遗址的考察中，认定洛书是半坡文化后期的产物，半坡彩陶的抽象鱼纹具有表示抽象的数量含义，八卦符号是从半坡鱼纹直接演化出来的。今传“洛书”是从半坡鱼祭场地布局分离出的数据图，由它变易而为今传“河图”^①。1977年7月，在安徽省阜阳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天盘上的图就是洛书，^②初步证实了河图洛书的时代真实性。

一般认为，河图、洛书是由圈点符号表示的两个图形，从数字分析，一为九数图，一为十数图。如把其中的九数图的圈点转换为阳爻、阴爻，便成为八卦，展示了卦爻演进之迹，这便是推说河图、洛书是《周易》先源的主要依据。而中医学将河图、洛书引入其中，其时甚早。在《灵枢·九宫八风》篇中，就载有以洛书理论为基础的九宫图，研究了风居于不同季节、不同方位的性质特点，适应季节时气的正风，时气过甚的实风以及不符合季节反常气候的虚风，其生理意义和致病途径，所侵脏腑、病机，示人预防疾病，有所依据。

二、“医源于易”论

“医源于易”，或者说“医本于《易》”，主要是基于对《黄帝内经》

①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版。

② 《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8期。

与《周易》的比较。也就是说，在中医学理论只能上溯到《内经》，而无更早文献可据的情况下，以《内经》与《周易》为相互参照的两个系统得出这一结论，是无可厚非的。从中医学发展的历史看，《周易》的思想和理论，对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规范化，确实有着重要影响，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与《周易》有着深深的渊源，也是不争的事实。

1.《周易》的基本原理，如郑玄所说有三：“《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正义》）其影响于中医，则如清章楠《医门棒喝》所说：“医者易也，有不易之定理，有变易之通变，有变易之化工，此即医本于易之要义也。”其一，易简或曰简易。即把天地人道复杂的现象和规律，统摄于最简要的原理之中。“《易》以道阴阳”，中医也用这一核心来把握复杂的生命现象，指导医学实践。张景岳说：“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此皆医中之大法。……设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玄，思过半矣。”（《景岳全书·传忠录》）其二，变易。《内经》直接使用了《易传》中日月、男女、昼夜、幽明、奇偶、虚实、动静、死生、贵贱等对偶范畴，并进一步发展了一些适合描述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对偶范畴，如表里、寒热、上下、左右、内外、腹背、脏腑、沉浮、阴证阳证等，为中医辨证思想奠定了基础。此外，“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素问·六微旨大论》）更是对变易原理的具体运用。其三，不易。《系辞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也就是说，阴阳变易中也有相对不变的规则。天地阴阳，人体内外，日阳夜阴，阳奇阴偶等，都是变易中的“不易”。中医的八纲辨证、治则等，便是从变中总结出来的不变之法。

2.《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有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时期，即春